

肉欲書寫的興起與哲學的缺席

——解讀《鵝毛筆》

◎ 羽 戈

導演：菲力浦·考夫曼 (Philip Kaufman)

主演：喬弗瑞·拉什 (Geoffrey Rush)

凱特·溫斯萊特 (Kate Winslet)

邁克爾·凱恩 (Michael Caine)

喬奎因·費尼克斯 (Joaquin Phoenix)

發行：Fox Searchlight Pictures

通往人們自己天堂的道路，總須穿過人們自己地獄裏的肉欲。

——尼采《快樂的科學》

一 語境：法國大革命與瘋人院

《鵝毛筆》的開場別有意味。一個沈鬱的聲音導引著故事，誘惑從耳朵轉移到眼睛，觀賞者的視線被拉向一張驚慌失措的臉，它同時又美艷絕倫。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斷頭臺。血氣淋漓的空間充斥著情緒高漲的民眾的急切呼喊，他們在等待一場華美的生命終結儀式的降臨。刑具上躺著的是麗娜小姐，法國的貴婦人。旁白中交代了她的身世，一個玩弄男性的高手，放蕩而不失高貴。只是她生不逢時，遭遇了革命的審判，卑賤的民眾成為法官，民主的道德是判決的終極依據。因為往昔的生活污跡，她被判處死刑。作為一個淫蕩的貴族，這在當時再也尋常不過。這個虛弱的女人被放置於斷頭鋸的刀口，一滴鮮血——來自先她一刻而去的死者——落到她的臉上，她的驚叫劃破長空，卻激起圍觀者更濃烈的興奮。雄壯的行刑者終於拉動套索，銳利的刀光閃過。鏡頭轉向近處一幢高樓的視窗，隔著玻璃，我們看到一張嚴峻而冷漠的面孔，它的主人不動聲色地觀賞完這一幕血腥的行刑。這是電影的主角，馬奎斯·薩德侯爵。接下來，已是若干年後，場景切換到查寧登精神病院——薩德被關押於此。

大革命。瘋人院。從一個直接到另一個，這裏潛藏的邏輯讓我驚異。瘋狂的法國大革命正是一個放大的瘋人院，參與者們被高尚的口號和激情蠱惑，癡狂的形狀舉措與瘋子並無差別。更為悲哀的是，瘋人院——如查寧登精神病院——裏還可能有幾個領導者是清醒的，他們的頭腦足以維繫瘋人院的生活常態，而在狂熱的大革命中，清醒者卻多半被送上了斷頭臺，或者落得緘默無語的命運，難以主導革命的潮流。當然，我要承認，革命的瘋癲只是暫時性的。等到人們的熱情隱退，歷史的時鐘又開始正常擺動。否則，同樣因性的過度作為引

發公憤的薩德侯爵就不會安靜地躲在瘋人院裏繼續寫作，而是如麗娜小姐一樣悲慘，被民眾以革命的名義宣判死刑。大革命中的法國是歐洲的瘋人院，正如查寧登精神病院是拿破崙皇帝統治下的法國的瘋人院之一。這一比照構成了故事的宏大語境。

二 啟蒙之後的政治

當然，以革命中的行刑場面為電影的開場，還有另一重用意：點明了故事的發生背景，這是現代性的開端，是啟蒙之後——這個時間細節深重制約著其後的書寫與政治行動。所以，當薩德的著作通過地下印刷發行的方式風傳於法國土地，致使民風嚴重敗壞，聽大臣朗誦書本內容的皇帝終於怒火沖天，命令將瘋子作者盡快槍決，大臣卻勸說，這樣獨斷的作為，只會使陛下背上羅伯斯庇爾式的「暴君」惡名，不如委派一個醫生去探察並處理此事。這一貌似無關緊要的鏡頭，卻再次映照出了啟蒙的政治精神。如果是中世紀，皇帝要處死一個瘋子，沒有哪個大臣能以這樣正當的理由來上書進言，更不必說能讓盛怒的皇帝收回旨意。但在大革命之後，法國雖然又進入了專制的帝國時代，但人道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已經深入人心，連執掌一國權柄的國王也為之頭疼。此處暗示的政治性，作為一條隱形的線，始終顫動於《鵝毛筆》的內部。

皇帝聽從了大臣的勸告，這便導致了洛高醫生的登場。這位信仰科學的先生一幅冷冰冰的表情，所奉行的準則是治療病人就如治療畜生一樣，需要粗暴和冷酷的藥方。他使用的一種醫治器具，類似刑罰中的桎梏，中間是可以旋轉的木架，下方是裝滿水的水桶，將病人置於其中，上下翻滾，讓病人的頭顱在水中浸泡一刻，翻上來，再沉下去浸泡，再翻上來，如此往復而不止息——這總讓我聯想起「洗腦」這個很現代的政治說法。我能推測出醫生的治理邏輯，即以這種近乎摧殘的方式，將病人混亂的思維重新清洗，最後還原出一個新的頭腦。到了後來，我們會發現，強硬的書寫者薩德侯爵居然也承受不過這樣殘忍的療法，開口求饒，但這為時已晚，醫生並不接納他的悔改——或者，醫生看出了他的悔改只是一時的妥協，他的心靈並沒有屈服。而最終的結局，卻是醫生的失敗——薩德至死都沒有放棄書寫——當然，醫生也不再堅持，他找到了對待瘋子們更實用的處方。

受命於皇帝的醫生在這裏有著雙重的身份，他既是政治權力的使者，又是科學精神——啟蒙思想的主流——的代表。這兩重身份合於一身，不應當引起我們的疑慮，因為這是啟蒙政治的正常表達：政治與科學-哲學的合流。但這種政治的權威，在瘋人院是否得以尊重，卻是一個不得不予以注視的問題——瘋人院逾越了正統的權力規制，如同瘋子逾越了正常人的思維。是的，我們看到，瘋人院在艾比神甫的精心治理下顯得安寧和井井有條，有人作畫，有人唱歌，還有人表演戲劇——出於對自我的肯定，神甫對前來視察的醫生說，是的，他們是正常人——但這僅僅是外層的假像，是有限的正常，我們應當不會忽略，瘋子們休息的房間，都是上了鎖的囚牢。沒有一個殘暴的社會可以這樣治理它的臣民。神甫的話或許能欺騙自己，但對醫生是毫無效力的。醫生不會追問瘋人院的正常與否，他所關心的，是自己代表的權威在這塊土地上的完好施行。

三 醫生、神甫、薩德：三種權力的對抗

當醫生的馬車駛進了查寧登的瘋人院，院長艾比神甫在歡迎他的時候，說了一句相當有意思的話：你是科學家，我是神甫，我們會合作得愉快。神甫是真誠的，真誠得讓人發笑，又讓

人憐憫。科學家與神甫在甚麼情況下才能愉快合作，歷史中罕有這樣的時刻，而在相反的一面，他們激烈爭鬥的例子卻取之不竭。對神甫的言論，老謀深算的醫生只是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。他定然要比神甫明白，他們分別象徵著兩種權力，即使這兩種權力不是勢同水火，但彼此相安無事的局面，卻不可能在他們身上發生。但他還是要給神甫一個面子，在向這個年輕人簡要轉述了皇帝的旨意之後，他便忙活自己的好事去了。

接著是怒氣衝衝的神甫與書寫者薩德的對話。神甫是上帝的孩子，他代表神權一方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可薩德，我們應該如何給這個魔鬼定位？神甫在後來說，他根本算不上魔鬼，他不過只是一個受欲望支使的骯髒的書寫者。這裏，我要引用一段話，這段精深的文字，出自薩德的一部小說，言說的物件是羅爾醫生——又是醫生：

我想表達一個禁忌。我想在眾神面前褻瀆神賜予我們的光潔的肌膚與皮毛，我要在神的面前一絲不掛，讚美偉大的交媾儀式的十八種戲擬的方式，我要讚美它們，讚美它們的姿勢，以此證明人類的最大歡愉和人類區別於那些飛禽走獸匱乏的想像力。如果我想向你證明：淫穢的並非是我們的欲念，而是對欲念的抑制和性事的忌諱，我想讓你看到所有被忽略的細節，我想讓你看到那些嘎然而止的背後，被刪節的和被閹割的人性的自然動機和遭遇。我知道你會無比仇視無比害怕，那麼，你應該知道其實我早已洞穿了你們孱弱的防線，你們文明的禮儀下無比齷齪的罪惡，我知道你們害怕甚麼，你道貌岸然，你舉止規範，你彬彬有禮蜻蜓點水一般地親吻淑女們誘人的臉頰與手背，難道你就不會在古舊的城堡裏，伸開你的力爪，旁若無人地撕破處女的屏障，而毫無體恤和對內心的譴責？我知道，你，人人敬仰的有教養的羅爾醫生，在我們都將老去的另一個時代裏，我將用我的文字讓我們的身體得到真正的休憩與鬆懈，而你，你所犯下的罪行將有目共睹，我的文字不朽，而你將和你污穢的機體一樣，腐爛，化為淤泥，為草木吸收，為後人給養。

這段肉欲書寫者的獨白，完全可以視為啟蒙之後西方「身體寫作」的思想宣言。它是如此驚世駭俗，以致使得薩德長久背負著色情小說家和瘋子的罵名，他的著作，兩百年來一直被列為禁書，冷藏於歷史與道德的暗角。高揚「人道」與「開明」的啟蒙人士竟然容不下一個薩德。無論真實的歷史，還是虛構的電影，這個人的存在，都成了啟蒙的巨大恥辱。所以，如果說信仰科學主義的醫生屬於啟蒙精神一派，那麼薩德的現身便有著反啟蒙的氣質；但在歷史的另一面，醫生與薩德又有著共同的敵人，即是代表著前啟蒙精神的神甫（壓抑現代性萌生的神權政治）——這很可能使他們簽定即時的盟約。在電影裏，神甫與醫生卻成了合謀者，以對付道德敗壞的書寫者薩德。正是這之間牽系糾葛的無盡纏繞，將《鵝毛筆》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，同時促成薩德使用的「鵝毛筆」上升為一種深沉的隱喻，書寫幻生著謎一般的意義。

四 神甫與醫生

神甫與醫生是合謀的關係，但這僅僅是神甫的一廂情願；僅僅是神甫認同這個荒誕的邏輯：你是科學家，我是神甫，我們會有很好的合作；僅僅是——他們的合謀關係，基於有一個共同的敵人，薩德，當敵人不再成為敵人，合謀自然破裂，而我們卻能發覺，神甫並沒有將薩德作為敵人，這便意味著合謀聯盟的鬆動。這兩個人物形象，一個是坦然俊朗的青年，一個是陰鬱刻薄的老人，他們又怎麼可能合作得愉悅？在更深的層次上，神甫的存在，就是對醫生權威的侵犯——瘋子們的出現和無可治癒，宣告著科學的失敗；用瘋人院將瘋子們囚禁起

來，貌似政治權力的生效，本質上卻是權力的異化；而讓一個信仰上帝的神甫擔任院長，這正是對啟蒙政治最巧妙的嘲弄。我隱約聽見這樣的聲音，在影片裏回蕩：「先生們，你們讓人類從神靈的庇護下走出，『運用自己的理智』，他們被慫恿出了勇氣，可最終，他們又難以承當自個體理性的重負，他們發了瘋，他們又必須回歸神靈的溫暖庇護之下，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落難的人們。」

當然，作為領導者的神甫並沒有說出這一事實。甚至我開始懷疑，他是否洞見事實的存在？或者，他洞見，但卻不願意相信，他寧可沉浸於自我營造的迷夢？奉著皇帝的指令，醫生來到瘋人院，這樣的政治危機，神甫難道沒有分毫察覺——連他的親信都有所警醒，只是他仍然傾向於認可好的一面？如果是這樣，那我不得不承認，他的精神是極度虛弱的。他把瘋人院想像為世間的天堂，他可以用耶穌式的悲憫目光看著唱歌的瘋子們，他可以相信讓薩德通過書寫，就能將他腦子裏的惡念傾泄一空，他可以相信這個惡棍的改悔，他可以故意混淆公共性的與私人性的愛，這些因素暫時緩解了他與醫生的衝突。但是到了後來，當醫生命人鞭打他心愛的女人，他沖了上去，要代受懲罰，醫生的一句話擊潰了他所有的夢想：年輕人，你的血，應該為你的神靈贖罪而流淌，而不是為一個世俗的女人。神甫分不清天堂與俗世，分不清彼岸與此岸，也許，他根本不願意分清，這構成了他的傷口，他的罪孽。老辣的醫生並沒有命令執行者繼續鞭打神甫，他簡單的一句說辭就已經衝垮神甫的信念堤防。自此之後，神甫對薩德的系列作為，都暗示著向醫生的妥協。合謀成為真實。西方歷史中的啟蒙政治對神權政治的勝利，在電影裏又得以完好展現。而我最後想起的是，讓神甫充當一個瘋人院的領袖，讓虛構的天國裏行走的全是瘋子，是否正是一種善意的反諷？沒有人知道。

五 醫生與書寫者

電影《鵝毛筆》中，洛高醫生與書寫者薩德純粹是一種敵對關係，而且是惡性的——只是接近結尾，才陡然出現轉機。他們成為敵人的原由很是簡單，薩德的作品所宣講的道德，傷害了統治者們良苦經營的社會風氣，進而擾亂了生活的秩序，威脅著政治的權威性——醫生無疑佇立於統治者一方——儘管他們可以暗地裏運行著放縱糜爛的勾當，譬如醫生與那個幼小而可以做他的孫女的妻子，這樣的醜聞如果傳揚出去，帶給民眾的危害性估計不會弱於薩德的色情小說；但在政治表面上，他們必須維持一種嚴肅而崇高的道德形象，即便不甘心作禁欲主義者，而要公然縱欲，那也必須找尋一個堂正而合法的理由——一百多年後在中國大地上經常發生的所謂「以革命的名義行淫」，在當日的法國應該能找到貼切的原型。

醫生（統治者）們是矛盾的，也正是這種矛盾讓他們輕易地惱羞成怒。我要在這裏講述一個《鵝毛筆》裏的鏡頭。醫生的小妻子茜敏，原來是一個修女，在出嫁之前，一直生活在沉寂的修道院裏，未曾經受過世俗的浸染。道貌岸然的醫生在給他的新娘建造房間時，特意叮囑年輕英俊的建築師，要在茜敏的臥室窗戶上安裝鐵制的柵欄。他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：不能讓這個稀世珍物被外面罪惡的紅塵世界誘惑和吞噬。但這粗重的柵欄只能囚禁少女的身體，她心靈的力量卻會衝破一切嚴密的羅網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她讀到時下流行的色情小說《貞德蒙塵》，曉得了「女人的魅力來自兩腿之間」這個道理。隨後她便引誘了身邊的建築師，並在房屋建造完工的那天，兩人私奔而去。留給醫生的信裏，茜敏寫道，如果不幸被醫生尋到他們，那麼兩人都會選擇自殺，以表示愛情的堅貞（還有一個意圖，就是要損壞醫生的顏面，這是脅迫）。洞悉真相的那一刻，醫生氣急敗壞地狂喊著妻子的名字（也許，他是真的愛她），在她的床上發現她日夜閱讀的《淑女詩集》，居然是被掏空的，內瓢便是《貞德蒙塵》。這部小說的作者，就是瘋人院裏的薩德。

醫生的一腔怒火自然要發洩到他認定的罪魁禍首頭上，薩德又遭受了一場苦痛的嚴刑。但這又能說明甚麼？對小說家的處罰是否有些冤枉？兩人之間的仇恨因此加劇了嗎？我更願意這樣理解醫生婚變事件的安排：茜敏作為現世生活的注腳，證實了薩德宣揚的觀念的正確；而於另一面，這也正說明了醫生與薩德的仇怨被激化到如此高度，更多的是因為私人性的誤會，而非應然的發展。命運在這裏出現了錯位。對茜敏這一角色的故意設置，貌似加劇，實則淡化了醫生與薩德的敵對立場。這便為電影的結幕提供了順暢的出路。《鵝毛筆》的收尾，是高明的洛高醫生，將瘋人院改造成印刷廠，讓瘋子們充當印刷工人，他們印製的，正是醫生曾經的敵人，薩德侯爵的作品。正是依靠這筆不菲的收入，醫生和瘋人院才得以興旺發達。印刷工廠的有條不紊的生產，以前只會胡鬧的瘋子們被教化得異常老實，並各盡其用，產品暢銷國內海外，這些場景標誌著資本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來臨。在這一階段，醫生與薩德的關係轉變為互惠的共謀者，前者充當了後者思想的傳播大使，後者則淪為前者的賺錢工具。說到底，正是這二者在精神深處的親緣，導致他們的相逢一笑，恩仇泯滅——當然，這樣喜劇的情境，惟有到了現代性的後期才會實現。薩德們接過醫生的接力棒，推動現代性走向縱深。薩德的子孫們在二十世紀又博得另外一個先鋒的稱呼：後現代主義者。

六 神甫與書寫者

比起醫生和薩德的權力關係，我必須承認，艾比神甫與薩德之間的敘事，卻被打上極端悲劇性的色調。儘管在神甫與醫生初次會面時，他就解釋說，瘋子薩德不但是我的病人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可後續的諸多場景都在展現，薩德從來就沒有把真誠的神甫當作朋友，甚至，他從來就沒有朋友，在他的觀念體系裏，友情——甚或還有愛情，這在他對探監的妻子粗魯而無情的舉動上可見一斑——的位置早被欲望遮蔽。此外，薩德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瘋子，只是他的行止與思想悖逆了世俗的潮流，迫不得已而居住於瘋人院，瘋人院成了這個精神局外人的避難所。如此說來，他並不像其他的瘋子那樣，與神甫構成一種精神依託的權力結構。他在精神上已超脫了世間的一切，是完全的自由者，也是虛無者。因此，神甫與薩德的關係本質上是單向性的，這對薩德而言，近乎無謂；而對神甫而言，無論如何也是一場盛大的悲劇。

或許還應加上神甫溫和而謙卑的天性，當他對薩德談話時，他總接近於一個乞求者的角色，小心翼翼，溫順節制，除了在信仰上寸步不讓之外，別的方面，站在他面前的薩德威風得儼然如同帝王。儘管身在囚牢，這個色情小說家卻可以擁有上等的筆墨，豪華的臥床、地毯和飾物；他還可以導演戲劇；他與神甫說話時可以左右刁難，甚至辱罵神子耶穌。他受到外界的攻擊與威脅之時，神甫千方百計地維護他的周全。應該說，神甫的朋友義務已經盡到極處。他愛薩德，無論後者犯下多麼嚴酷的錯誤，甚至無法彌補，譬如醫生所言，薩德是殺死瘋人院的女僕——也是神甫的愛人——美黛蓮的最重要的兇手，必須給予他相應的懲罰，醫生主張割去薩德的舌頭，聽著房間裏那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喊叫，靠在門上的神甫也同節奏地以頭撞牆，他內心的悲痛並不比受處罰者有所貧弱；在薩德臨終前的瞬間，俯視著這個不知悔改的靈魂，神甫依然真摯地為他祈禱懺悔。是的，他與薩德之間沒有絲毫仇恨，他愛薩德，他愛所有的人，因為他們都是天主的孩子。

但他象徵的權力——神學，卻與薩德象徵的權力——肉欲，有著無法消弭的矛盾。一個是性靈之上，一個則認同「肉身的欲望就是一切」；一個是禁欲主義者，一個是縱欲主義者——他們都將「靈」與「肉」對立起來，並分別據守其中的一端，堅定猶如磐石。這便註定了他

們永無牽手的可能，而只是徒勞的感化，還有激烈的戰爭。但我們又能在《鵝毛筆》中看到，神甫與薩德都無法擺脫對方所代表的權力的糾纏。神甫的愛欲使他在電影的後半段舉步維艱，他愛著漂亮活潑的美黛蓮，卻又不敢承認對她的愛，這是對天主的犯罪。在一番激情狂吻之後，他對心愛的女子說，我愛你，可隨即又補充，因為你是天主的女兒。這是他的兩難。最終，他愛的人死了，他與冰冷的屍體完成了性愛，高潮的那一刻，耶穌塑像的眼睛開始流血。這是何等悲切的隱喻。

薩德的日子也不好過。儘管他是個信仰上的虛無主義者，他只信仰肉欲，在信徒看來，這根本算不上信仰。他整天寫那些宣講性變態與性虐待的色情小說，鼓動潛伏在人們心靈幽暗處的撒旦。事實上，這個人比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裏的兄長伊凡還要絕望。可當他得知，死去的美黛蓮居然是個處女，他徹底垮掉了，身體順著牆壁癱軟到地上。一種美好的念頭戰勝了他精神天地裏所有的污濁，神甫說，畢竟，因為你的心中還有愛。這是靈，行走在光潔的水面。魔鬼是沒有靈的，而薩德不是魔鬼，神甫早就說過，他僅僅是一個被魔鬼迷惑住心竅的邪惡的書寫者。他是有靈的，所以神甫從未放棄對他的拯救。

好了，我終於要直面那個意味深長的鏡頭，那是神甫與薩德最後的交鋒。在漆黑的地牢裏，被割掉舌頭的薩德用自己的糞便在牆壁上寫滿文字：淫穢、色情、決絕的牆上書寫（尼采）。神甫舉著火把來了，望著昏迷不醒的薩德，祈望做臨終前的拯救。他割開薩德口邊的套索，將他喚醒，然後將十字架放到他的嘴角，讓他去親吻耶穌的塵世信物。——讓人驚悚的事情發生了，薩德猛然咬住十字架，用力地吞了下去，死了。十字架成了殺人的兇器。到底是耶穌拯救了薩德，還是謀殺了他？神甫已經喪失了回答這些問題的信心，最終精神崩潰。電影的兩大主角都落得同樣淒慘的結局。這場戰役沒有勝利者可言。——也許有的。我聽到這樣隱秘的聲音，薩德死於十字架，他成了教諭肉欲書寫的耶穌；而發瘋的神甫，卻開始了薩德式的書寫。薩德是勝利者。

七 書寫的暴力

《鵝毛筆》的終結一幕，是崩潰了的艾比神甫被當成瘋子關進了囚牢，新任的院長——同樣是一個年輕英俊而略顯憂鬱的青年神甫——在醫生的陪同下前來探望，艾比對這個似曾相識的影子說，你若有善心，請給我羊皮紙和筆墨，我看見過魔鬼的臉面，我要繼續書寫那尚未寫完的故事。聽到這話的新神甫開始驚惶失措，最後在艾比絕望的狂喊中倉皇逃離。而接下來的鏡頭更富戲劇性，美黛蓮的盲母親，給艾比送來清洗乾淨的床單，裏面藏著紙筆和墨水——這無疑是當年的美黛蓮與薩德的一重化身。電影的最終一組畫面，是瘋子艾比手執鵝毛筆，虔誠地伏案而奮筆疾書，潮濕的情境裏同時迴響著他的告白：親愛的讀者，下面這個故事是由艾比神甫寫的，故事很血腥，人物墮落，主題也不健康。但要尋真理，就要認識罪惡，這樣才能全面洞察人性。

艾比步上薩德的灰暗後塵，成了又一個肉欲的書寫者。然而，為甚麼要書寫？為甚麼要執迷不悔，乃至置生命於不顧地書寫？薩德因為肉欲書寫（還有變形的性作為）而進了監獄，後來被轉托到瘋人院，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對書寫的嗜好，書寫已經沉積為一種無可治癒的疾病，讓他真正地發瘋（同時，書寫也證成著存在的勇氣，沒有書寫，活著就喪失了意義）。最初他是將故事寫在紙上，由美黛蓮偷偷傳出印刷；在被沒收了所有的紙張筆墨之後，他用燒鵝的骨頭，蘸著紅酒，將故事寫在床單上；為了阻止他的書寫，艾比搬走了他的傢俱、床單及一切飾物，但薩德又將故事寫在穿著的衣服上，用自己的鮮血作為墨水；終於，他被剝

離得一絲不掛，連假髮也被除去，但他又通過囚牢牆壁的縫隙，由瘋子們轉述，將故事宣講出去；這導致了美黛蓮的死，因此，他被割去了舌頭，言說的權利遭致淪喪，可這個瘋子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，以糞便作顏料，將故事塗在牆上。這聽來讓人感覺恐怖，可它卻實在地發生。沒有了舌頭的薩德，本身已化為一條顫慄的舌頭，宣告著肉欲書寫的時代的赫然降臨。

為甚麼要書寫？為甚麼要書寫性虐待，而不是歡快的頌歌和讚美詩？為甚麼要書寫這些可能促使人們犯罪的肉欲，而不是光明和美好的一面？面對神甫的質問，薩德的回答是，世界又不是我創造的，那些邪惡已然存在，我只負責記錄下來；他以一幅傲慢的口氣說，年輕人，我見過地獄，而你僅在書上讀過。依照這些顯明的言論，我們似乎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，薩德是作為見證者而書寫的，他只是為了告知人類這個世界的真相；至於說為甚麼要寫盡惡的一面，道理也很簡單，因為這一面已為善的陰影濃重掩蔽住了，必須將它清晰而完整地呈現出來——如同影片結束時艾比神甫的獨白：「但要尋真理，就要認識罪惡，這樣才能全面洞察人性。」在作為歷史與生活的見證者的意義上，艾比跟隨著薩德的腳步。

但艾比真的在追隨薩德嗎？他追隨的是真正的薩德嗎？除了發瘋，除了對書寫的病態迷戀，除了以「洞悉全面的人性」這一目的而進行肉欲書寫，他們的命運又將在哪些方面出現重合？之於薩德，刺激他書寫的原由，並非僅僅是記錄和見證世界——如果是，那他就難以作為一個忠實的記錄者而名動後世；他在記錄的同時，已經暗藏著一種強烈的價值取向，價值的刀鋒直指判決他是瘋子的世俗社會的道德。理性的啟蒙精神，還有更早的神權思想，都是肉欲書寫的天敵。在敵方的沉重壓制與逼視下，書寫構成了一種暴力行為：不僅是「寫」，而且是「做」——於瘋子薩德，沒有其他的抗擊方式可言——它的毀滅性力量既施予對手，也會禍及自身。這正是暴力書寫的難處。甚至說，這是一種天然的疾病，書寫者內心的欲念被書寫的暴力點燃，令他無法自控，身不由己。肉欲書寫使書寫衍變成了足以與肉欲相抗衡的欲望，它主宰著薩德後期的生命。薩德不停息地寫，寫在被單上，寫在衣服上，寫在舌頭上，最終寫在牆上。書寫是魔鬼對薩德的詛咒，讓他飽嘗欲罷不能的痛楚。輕盈的鵝毛筆是一個絕妙的反諷，因為它必須承擔與本身並不相符的書寫的重量，承擔瘋子們對書寫無與倫比的狂熱的愛欲。當然，我還要指出，艾比神甫的書寫並不能與薩德同日而語，書寫之於曾經篤信上帝的神甫，至多是一種悔改，一種信仰的轉向；而之於堅信肉欲才是生命本質的薩德，書寫的雙重暴力性充溢著末世狂歡的氣息，它在召喚新世界的同時，也是對自我生命的哀悼（也可以說，那一場災難過後，美黛蓮死了，薩德死了，神甫是唯一的倖存者，所以他的書寫才是一種哀悼，對兩位亡靈，也是對逝去的基督教精神；而薩德的書寫，因為註定不為他生活的時代所容，所以只得決然指向著未來，「我的文字不朽」——這個讓人恐懼的先知）。

八 哲學的缺席

如我所言，堅持肉欲書寫的薩德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，我願意將他與伊凡並提，儘管他並沒有寫出伊凡式的長詩，但對於禁欲主義的啟蒙世界，每一部宣揚肉欲敘事的小說都是一首激揚的詩歌。如果能肯定薩德的詩人身份——醫生代表政治，神甫代表神學，這些是無須存疑的——那麼我便可以說，《鵝毛筆》所展示的，是詩歌、政治與神學三者之間的尖銳衝突。它們相互對抗，又尋求平衡與苟合的契機。最後，神學權力黯然退場；艾比神甫向薩德的轉化，暗示著神學對詩歌的妥協；變臉後的洛高醫生開始印行薩德的小說，可以說是政治權力與詩歌的合作，即使前者的顏面有所損傷，但將瘋子們成功改造，也是無上榮耀的功德。

《鵝毛筆》的收尾是近乎完美的，因為沒有哪個場景能如此映照出啟蒙之後現代世界運轉的和諧常態。

但我卻悲傷地發現，在這場紛亂的爭鬥中，有一種事物無奈地缺席：哲學（當然，這是古典意義上的，現代哲學已向政治投誠，換上了科學的臉譜，它在影片中一直閃現）。我希望這是導演的有意為之，正如我有意讓美黛蓮在我的書寫裏缺席一樣。這個在熊熊火光裏悲壯慘死的女子，周旋於三種權力之間而無法自拔，無法投入那個瘋人院外的黑衣騎士的懷抱，那才是她的家園，她的烏托邦。她知道與艾比的愛是不可能的，對於神甫，她不是聖潔的天使，而是黑色的撒旦，正是她的死，導致著神甫轉向為一個惡的書寫者。對於薩德，她只是一個傳送作品和泄欲的工具，薩德如尼采一樣鄙棄女人，儘管到了後來，她化為一種美好的象徵，擊碎了薩德的惡念，但這僅是瞬間的轉機，她的獻身，並沒有將薩德教化為一個良人——這個惡棍至死還在書寫淫穢的故事。而對於醫生，美黛蓮卻是無足輕重的，醫生把她當成與神甫、與薩德鬥爭的道具，同樣也可以說，她成了這場政治紛爭最無辜的犧牲品——美黛蓮遭殺害之際，醫生本來有解救的可能，但他冷漠地皺了下眉頭，轉過身去，順帶還拉緊了門，以防止美黛蓮呼救的聲音傳了出來。一個青春的生命，就這樣隕落於三方的角力。政治、神學與詩歌之間的爭鬥委實太過慘烈。

但也正是美黛蓮，讓我發覺到哲學在啟蒙之後顯現的可能。《鵝毛筆》中最具哲學精神的一句話，就是出自這位妙齡少女之口。當情欲沖發的薩德要和她做愛，她狠狠地打了他一個耳光，氣憤地說：「有些事情是只能寫，而不能做的。」——為甚麼只能寫而不能做？哪些事情「非如此不可」？這不正對應著柏拉圖關於哲人的教誨？不正對應著哲學與「言辭的城邦」的關係？瘋子薩德不但寫了，而且做了（書寫與暴力的合流），這不僅顛覆了古代性，更將啟蒙精神與現代性推向了極端。作為政治人的醫生正是看中了薩德「做」的一面，才甘願印刷發行他的作品。既寫又做的薩德「成了現代社會的英雄和聖徒，後現代社會的先知」（友人王恒語），他的確是不朽了，只是他沒有看到，這兩種社會都已淪陷於虛無主義的深淵。不能辨別「寫」與「做」的邊界，就難以懂得溫順與節制的美德，也就模糊了「可能」與「不可能」的界限，最終，「一切都是可能的」，「一切都是允許的」。

但我們並沒有理由給予薩德過多的指責，我們不能漠視他所置身的語境：瘋人院、啟蒙之後。他死後的一百年，德國人尼采才開始發瘋，才開始痛切地攻擊基督教和啟蒙人士。如果說尼采是薩德的精神後裔，那麼我們可能更容易理解，為甚麼在《鵝毛筆》裏，哲學是處於缺席狀態的——整個啟蒙以來，曉得「寫」與「做」之區分的哲學就一直枯竭著，掛著青黃不接的病容。如果能承認尼采的話：「如今，哲學應是文化的毒藥」，那麼我們也可以領會美黛蓮現身的意義：一個曖昧的藥引子。她的死，似乎正昭示著現代人對這種藥方的質疑。他們更折服於薩德的魅力，情願在肉欲書寫的虛無主義大道上永久狂奔下去。

出於對過去的哀悼，還有對未來的期望，我願意在薩德的墓碑上刻下這樣的銘文：

我死了，你們還活著。

你們不認識我如同你們不認識世界。

我的遺容化作不朽的面具，

迫使你們彼此相似：

沒有自己，也沒有他人。

……

所有的眼睛只為一瞥而睜開，

沒有我的歌，你們不會有嘴唇。
而你們傳唱並將繼續傳唱的
只是無邊的寂靜，不是歌。

——歐陽江河《公開的獨白》

後記：寫下這些沉重的文字，一種久違的虛脫感撲面而來。這是一部折磨我已有半年之久的電影。我不否認它的缺憾，但我更願意認可它的偉大與深刻。本文的寫作得益於張志揚先生的評論《死去的是美黛蓮》和我的學長王恒博士的回應文章《死去的是美黛蓮？》，在此表示謝意。可惜沒有聽過劉小楓先生關於《鵝毛筆》的講座，不然會有更完好的論述。

僅以此文獻給我尊敬的王恒學長，和親愛的楊慧磊師弟，沒有與前者的幾次交談，我無法理清一條明晰的思路；沒有後者寄來的影本，我不會如此快速地將文章寫出。也感激我們的「野獸的城邦」，沒有這個友愛的共同體，就沒有我今日的欣慰。

2005年4月10日改定於寧波

《二十一世紀》(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期 2005年7月31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四十期（2005年7月31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